

中国当代警官 的倾诉



ZHONGGUODANGDAI
JINGGUANDEQINGSU



中国当代 警官的倾诉

雨时 如月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825 I
20
F-84P1

中国当代警官的倾诉

雨时如月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插页0 字数12万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200

ISBN 7—210—00665—6/I·206 定价：2.10元

前言

一个情理之中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

事实上，最早反对我们写这本书的，是一群中学生。无论在他们的老师或是家长看来，他们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孩子。

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自行车破了胎。为了不迟到，另一个孩子用自行车捎上了他，于是遇到了警察。这位“警察叔叔”驾驶着三轮摩托车，粗暴地用边斗把他们撞了下来。而且，命令他们自己拧下自行车前后轮的气门芯，远远地向马路对侧抛去。两位中学生承认自己违反了交通规则，但他们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

“叔叔，他们很坏，简直象土匪！你不要写他们。”

我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们一道，愤愤不平地在书房里向我倾诉。

当然还有另一种倾诉，他们都真诚地喜爱另一种警察：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中的警官亨特，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甚至亨特和麦考尔每次缉捕到凶犯后，一定反复强调的那几句著名的台词：“你有权利保持沉默，有权请辩护律师。如果你请不起，法庭可以代为指派一位。”也成了孩子们互相调侃时的时髦用语。

孩子们不了解，亨特和麦考尔宣读的，是一九六六年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颁布的“被告人权利”。他们不了解这项法律的历史背景，以及这项法律给美国警官带来的麻烦和困难。儿子对我说：“我们喜欢亨特，因为他是真正的警官。”

这种责难和不解，当然远远不止是中学生们。采访过程中，一位文学界的老前辈到我住的行署公安处招待所看望我，见面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采访他们干什么？”

我当时还无法对“真正的警官”这一个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我想，“真正的”首先是“真实”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们有幸参加了江西省公安厅和江西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的公安文学研讨会。会议最后一天的日程，是公安作者和年轻的作协会员之间的对话。

也许是出于礼貌的考虑，公安厅方面的主持人把这种“对话”解释为，又“请作家们介绍创作经验。”我们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的确也作了发言的准备。

同样是出于礼貌的考虑，我们坚持请公安作者先谈。于是，我们听到了两位年轻的刑侦队长的倾诉。

号称“圭峰山水天下稀”的圭峰奇景，已经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忘了。只有在圭峰脚下听到的两位警官的倾诉，却还极其鲜明地保留着。他们的奉献是真实的，他们的欢乐是真实的，他们的苦恼是真实的，他们的困惑也是真实的。可以说，他们的发言，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在这种情绪下，调整会议的议程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我们说：“无论你们二位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如何，但你们作为刑侦队长，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真感谢你

们让大家长了这么多见识，应该说，你们也是新时期中最可爱的人。”

出人意外地，两位年轻的警官站了起来。他们走到我们面前，各自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鞠得我们几乎要流下泪来。会场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而这种沉默的实质，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悸动。在那一刻，我们只想到两个字可以包容这无言的一切。这就是：理解。

一切都从那一刻开始，但也仅仅只是开始。

应该说，我们不仅心甘情愿，而且是主动走进公安这座“神秘之宫”的。江西省公安厅的领导给了我们热情的支持，公安厅政治部更给了我们具体的帮助。我们选择了江西省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即上饶地区、宜春地区、赣州地区、九江市进行调查采访，先后考察了四个市、八个县和许多基层派出所。源发于圭峰的那条情感的小溪，就始终伴随着我们的足迹流淌着。

更深入人心，一曲《献给爱丽丝》的钢琴曲由远方悠悠地飘来。我们整理采访记录，我们翻阅大量中外关于警察的资料，那心情，就和乐曲一样的痴情，一样的真诚，也一样有一种淡淡的忧虑。

“真正的”首先是“真实的”。我们将把这一部真实的《当代中国警官的倾诉》，奉献给我们的读者，尤其要奉献给当代中国警官。

当偏见的情感砝码移上历史的理智天平，中国国民的倾斜心理或许能稍稍实现平衡。愤怒、诅咒、互相指责、互相骂娘终归无济于事。但愿你不会嘲讽地说一声“阿门”，而

目 录

1	第一章	揭开黑箱
16	第二章	沉重的剑
31	第三章	深谷枪声
48	第四章	盖洛甫的启示
63	第五章	裂变冲击波
77	第六章	特种警察部队
93	第七章	欧洲大陆上的幽灵
109	第八章	世界人权宣言
126	第九章	决定的瞬间
141	第十章	警官的诺言
158	第十一章	历史和现实的困惑

以... 第一章 揭开黑箱

第一章 揭开黑箱

所谓“黑箱”，是指当人们对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类现实系统的内部结构和机制缺乏了解时，这个系统就如同装在一个既不透明又严加封闭的箱中。人们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而无法进入黑箱进行直接观测。

《系统论》

一九八八年八月，江西油泵厂炊事员王太曹某与食堂管理员发生口角，争吵后闷闷不乐而大量酗酒。酒后，曹某从棉麻公司五楼上跳下，似乎想纵身自杀。这是发生在明媚的夏日里，一幕不那么明媚的悲喜剧。所幸曹某在飞堕中，被一个木构架的桥垛挂住，他撞昏死过去，奄奄一息地悬在半空。当时在地面围观的有两三百人，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设法救援。九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兆高动情地回忆这一段往事，他有一种欣慰，他说：“那么危急的场面，谁上？是我们的警察，带着一名联防队员，从大楼上用绳索悬垂下来，冒死去救人民群众。”他又有一种哀怨，说完后就是一声深深的叹息。

曹某仍然昏迷。为了安全拖带，警察掏出手铐把曹某和自己铐在一起。不想这一行动却引发了曹某亲属和部分围观群众的误解，警察是在一片谩骂声中，履行了他的、或者不一定是他的职责。

“他犯了什么罪？你敢随便抓人！”

“狗警察，人被打成了这个样子，你还用铐子！”

警察在救援过程中，口袋里当月的收入一百四十余元全部失落，而且一直也没有找到。他最后所能做的，是默默地打开手铐，无言地离开现场。

这个警察是盆城镇派出所的方义标。采访中我们没能找到他。我不知道当时在一片谩骂声中他是否落过泪。但我想他是应当哭泣的，至少他的心应当哭泣。

八八年六月十六日，上饶市水南派出所指导员夏恩田接到报案。京山电影院外，有一名上饶水泥厂的工人被歹徒用鱼叉捕伤。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五十多岁的夏恩田带人跑步赶赴现场。根据当事人对歹徒特征的描述，派出所的警察们奉命分头追击。夏恩田气喘吁吁地追到二中附近，发现一条面貌衣着酷似歹徒的青年，决定把他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不想这个青年半路挣脱，飞也似地向来路方向奔跑。夏恩田是拼出了半条老命之后，才把青年重新抓获的。他不无沮丧地告诉我，情急中，他用警棍捅了青年一下，用手铐铐了青年一下。说这话时，夏恩田眼里透出几分苦涩，透出几分辛酸。这当然是一场误会。事后，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警官，

三次到青年家长的单位道歉，到青年所在的学校检讨、受教训。这对我是一个要引以为戒的教训！”身体明显地过于单瘦的警官，就这样向我倾诉。

我们无意为夏恩田的过失开脱，但我们不能不想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果夏恩田不去气喘吁吁地追踪歹徒呢？如果这位青年学生对我们的警官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信任，采取合作的态度而不是脱逃呢？那或许会有另一种结果。

我不知道那位使用鱼叉的歹徒是否也知道夏恩田的肇事？我不知道他听到夏恩田检讨的故事后是否会笑出声来。但我想他是有理由笑的，那笑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八十五次特快列车沿着上饶火车站的站台滑行，女播音员悦耳的声音介绍着上饶集中营的历史，介绍着上饶的物产风情。于是，这声音在上饶市公安局董政委的心里，唤起了

一片深情、一片温馨。他站起来收拾行装，准备列车停稳后就下车。

他万万没有想到广播里突然传来了播音员的忠告：“上饶市的社会治安不好，请旅客们多加小心。”

这对董政委不啻是一个过于残酷的玩笑，他立即显得有些狼狈不堪。他身穿马裤呢警服，无疑是一名警官。他在上饶市下车，无疑是上饶市的警官。他立即成了全车旅客注目

的焦点。董政委感到了全车旅客责难的眼光，他深知这种责难的分量。他整了整警帽，想从容地承受这种压力。可他心里明白，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其它当代中国警官，谁也无法承受这

种无言的责难。——《中国青年报》1989年11月15日第1版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我们要有勇气走进公安这只“黑箱”。到过华盛顿的人，都会如醉如痴地谈论这座城市的美丽。白色的建筑，古罗马风格的雕塑及无数的博物馆和博物馆中无价的珍宝，还有缓缓流经市区的宽阔的河流，一座座繁花盛开的花园，乔治敦区诱人的英国风情小城。但这只是华盛顿闪闪发光的的一面，另一面却充满了犯罪、吸毒和贫困。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截至10月31日止，华盛顿当年死于暴力凶杀者已达288人。引人注目的是，谋杀案的百分之六十起因于吸毒，牺牲者的百分之八十一是男性黑人青年。年轻人急于摆脱贫困，设有文化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就很容易受到犯罪行为的诱惑。《苏维埃消息报》根据苏联内务部刑事调查局的统计数字报道：一九八八年，全苏平均每天发生盗窃案2,160起，强奸案24起，谋杀案60起。即年窃案788,400起，强奸案8,760起，谋杀案5,810起。这是一连串让人喘不过气的恐怖数字，过去在苏联是严格禁止公布的。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开放和改革的措施，公开了对犯罪的统计报道。

当代中国的情况如何？我们没有来得及调查。但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康宏弼曾经扳着手指头向我们介绍，现在一般刑事案件，在全省已由每月一千二、三百起发展到每月两千起，重、特案件已由每月一百二十起发展到四百起。其中，尤其是暴力性案件、恶性杀人案件，以及以谋财为目的的犯罪案件非常突出。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类型和动向，

如非法走私黄金、文物，绑架人质，卖淫嫖宿等。

我们终于理解了上饶市公安局董政委离开85次特快列车时，心情何以会那么沉重。只是有一句他当时没有来得及说，以后却由许多警官向我们倾诉的话，引起了我们特殊的注意。这就是：“案子破不了我们公安要负责，可发案率这么高，怎么也怪我们公安一家。”

在赣州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们走进了关押着判处死缓女囚伍某的监舍。伍某曾在承包某部队企业的任期内，挥霍了百万元左右的国家财产。她住过每夜一千四百元的高级宾馆，豪华的总统套间里，柔和可调的灯光，氤氲浮动的暗香，沁入脾胃的饮料，心旌迷乱的桑拿浴，使她享用了近代文明提供的一切奢侈豪华。她现在在监舍里已经不能随意仰望那蔚蓝色的天空了，但从广州到哈尔滨，她乘坐过翰波音747客机，不知在蓝天下划出过多少梦幻的轨迹。

“看腐败看得多了，自己也腐败了，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显得过于白皙的伍某，一边平静地看着她通铺上的水盆，也许还称得上是时髦的衣装，一边平静地对我们诉说。她的眼光里，有着一一种忏悔的彻悟，更多的是死的冷寂。那眼光里仿佛还别有一番话：上帝已经死了，世界正在走向末日。

我们觉得这一切有些近乎天方夜谭。但随着身后铁门的哐当声，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现实的，现实得和阳光照射在监室外面的光斑一样，就在你和我们的身边。

日本《东京新闻》88年12月1日载文谈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

中国为了实现理想的经济增长，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多。问题之一是：物价上涨——支付物价补贴——财政赤字扩大——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加剧——这种恶性循环越来越加剧。问题之二是：城市化过程的急剧发展和生育高潮的到来——住房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促进住房建设——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加剧。问题之三是：个体农户出现，农业生产在急速增长之后开始减速，到一九八七年再次成为农产品的进口国。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小企业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外流。在农业发达地区从事农业的，也只剩下老人和孩子。除了这三大困难之外，还有贯穿整个社会的对本国货币的不信任感和干部的腐败现象。

我们认为，《东京新闻》的这一段评介的确耐人思考。日本人有资格作出这种接近权威的预测，道理很简单，包括日本在内的当年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伴随经济起飞的同时，无不出现过道德滑坡和社会混乱的过渡过程。当年的南朝鲜、台湾、香港如此，今天的苏联、波兰、南斯拉夫也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渡过程，都直接导致犯罪率的猛增。在当代中国，我们的商品经济是在后封建主义的土壤上，在不具备商品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上推行的，即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治安就必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们的公安和我们的警官，除了无

知，至少是一种不公平。

在瑞昌县公安局看守所，我们旁听了对一个拦路抢杀犯的审讯。罪犯是年仅十八岁的乡镇青年，还只刚刚讯问他的姓名和家庭成员，他就呜呜地哭出声来。文化程度，小学毕业。但从他接受审讯中表现出来的智商水平，我们认为充其量也只是个半文盲。

在赣州市公安局看守所，与伍某同监关押着一个广东女青年。她衣着打扮已经全无乡土气息，但却千真万确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全文盲。她的罪名是参与制造假币，她说不知道这是犯罪。

一九八四年，瑞昌县高潜电站发生水渠用水权益纠纷。罪犯余某认为投诉无门，决定自行报复了结。他趁放映电影之机，将当事人一个个诱骗出来，一口气杀了三个，然后只身脱逃。瑞昌县公安局闻讯围堵追捕，到第十日在深山中将余某擒获时，他已奄奄一息，无法自己步行下山了。

瑞昌县公安局的刑警，是轮换着把余某抬出深山的。考虑到他多日不曾进食，几次由局机关食堂给他单做了面条。等到他终于醒悟过来，却只能呼天唤地地悲号了。“天啦，我本来是有理的，要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警察，我怎么会去杀人！”

瑞昌县公安局曹副局长脸上掠过一丝轻微的痉挛。年轻的警官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与文盲严重的是，文盲还要加上法盲。”

在赣州市公安局各科室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不少人

谈到了当代青年，特别是当代城市青年，包括当代大学生在内的新走向。服装发式、化妆品、流行音乐、暴力文学、咖啡屋、酒吧、迪斯科舞厅，这些短期文化现象，基本上由当代城市青年体现着和领导着。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经济时代的产儿。

在赣州，舞场消费可以由几元暴涨到八十元。据一位台湾观光客介绍，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此间营业性舞厅、舞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台北。舞厅的顾客百分之九十是青年，时常因为舞票、舞伴发生治安纠纷，八八年五月六日甚至激化到发生了杀人案件。

我们来到广丰县看守所，对收审的和在押的人犯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百分之六十五；文盲、半文盲、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百分之六十二；有嗜酒或酗酒史的占百分之五。青少年犯罪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即经济类犯罪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因抢劫、盗窃和扒窃犯罪的占百分之八十。畸形的挥霍性消费欲望和有限的收入之间的矛盾，是青少年经济犯罪的重要原因。

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文盲、半文盲队伍的急剧扩大；一方面，是当代青年追求所谓自我价值的实现表现为一个曲折的过程。既要接受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又要千方百计地对自我进行顽强的表现。青年问题、教育问题，如此扑朔迷离地扭结在一起。两个完全悖反的文化误区，形成对社会治安的共同冲击。其实质并无变化，都同样使我们的当代中国警官头疼。我们几乎对所有采访过的警官都说过：“你们这一任警

官是最难当的。”几乎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反对，唯有苦笑而已。

让我们进一步揭开黑箱。

每年的九月八日是国际扫盲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统计报告：世界人口中，15岁以上的文盲有8.84亿人，而中国的文盲、半文盲竟高达2.2亿，即地球上每四个文盲就有一个中国人。而且，文盲率最高的国家还在产生大批新的文盲。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七年间，中国共流失四千万中、小学生，有百分之七十五从事各种赚钱的职业。还有，当代中国至少有三千万儿童仅仅只读到脱盲状态，还有百分之五的儿童根本未入学。

中国的文盲大军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无穷的忧患。知识是文明的标志，无知总与野蛮和愚昧为伴。低智能的劳动群体，促使国家最终丧失走向现代化的能力。

中国之所以沦为世界文盲大国，当然与现实的教育状况有关。首先是学生厌学。我们曾读到当代大学生的一则《新陋室铭》：“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唯吾心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琢磨下围棋，寻思看电影。可以打扑克写家信，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神。虽非跳舞场，堪比游乐厅。心里云，混个文凭。”可见渴望学习的势头已消失，代之以另一种渴望：金钱！

与厌学对应的，则是厌教。《解放日报》曾经惊呼：“闽东八百教师弃教，百余学校被迫关门。”1988年，广东又有两千余名中、小学教师弃教经商。